



中国岭南建筑文化源流

第一部分

异质地域下的岭南

中国岭南建筑文化源流

第一章

绪论

源流,即事物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建筑文化发展同样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史诗,不同地域又书写着这部史诗的不同篇章。基于背山面海的岭南这一独特地域发展起来的岭南建筑,亦是中华建筑文化中灿烂的一支。

任何地方建筑都具有文化地域性,即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地域特征等在群体或者个体建筑空间方面的反映。岭南建筑文化产生于华夏文化和岭南本土百越文化的碰撞,保留着从百越时期流传下来的本土气质和风格,体现了丰富的岭南地域特征。

人类的起源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以文化的生态史观来看,我国自史前至历史早期的民族文化千姿百态,谱系繁复而又统一。形成这种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自然地理统一体中不同层次的分域结构。岭南地区是我国自然地理体系中相对独立的分域,更是早期人文、历史多元化一体格局中的特殊环节,岭南地理的特殊性体现在与早期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地貌、土壤、气候、动植物种群等生态因素上,这一分域特点自出世以来就已经基本定型,成为史前至历史时期南方族群文化相对独立于中原华夏之外的重要背景^[1]。汉文史籍从很早起就关注南方生态特殊性对人文的影响。《后汉书·南蛮列传》载传说时代的南方地区“所处绝险,人迹不至”“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描述的就是湿热的山地丘陵环境的特殊性。

复杂的地理条件是造成岭南建筑形制上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防风、防雨、防腐、防毒虫猛兽是共同的要求,在沿海台地平原地区,还要重视防洪、防潮,因此,干栏式建筑逐渐成为岭南地区早期主要的建筑形式,林木茂盛则为建造干栏式木构建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在此状况下,以后发展起来的岭南建筑,不论是木、石、砖构,都十分注意抗击自然袭扰的功能。

文化和气候条件是空间次序上的主要决定因素。岭南气候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日照充分,气候温暖,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夏秋多台风,全年适宜植物生长,远古时代更是林茂果丰,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独特的气候因素,必定在属于文化一环的建筑中产生制约性的影响。直到今天,气候条件对岭南建筑注重通透的风格特色都还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不仅如此,特殊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还更多地投射在聚落形态上。考古资料显示,岭南先民聚落总体表现为“大分散,小聚合”的区域整体结构模式,与中原聚居总体模式“小分散,大聚合”正好相对。所谓小聚合是指被自然分割为若干空间单位的族类聚居,有独立的组织结构、环境系统。在小地理单元中,聚居文化模式和整体结构是与其自然环境相呼应的;小组团的历史聚落,体现出社会体系与自然体系往往是彼此对应而辩证产生的。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书写的方式,从历史发端、形成及发展的地理历史环境、人文影响等各个影响因素综合分析,比较全面地论述岭南建筑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 岭南建筑发展的地理和文化背景

岭南建筑既有承袭中原文化、吸纳邻近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一面,又有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一面;岭南建筑集中地折射出岭南文明开发的历史轨迹,积淀着岭南的人文思想、民情风俗。

相应于岭南文化的多元化,岭南建筑文化景观及文化内涵,也是复杂的。由于文明推进的不平衡、地形气候的差异、民系的区别以及毗邻地域文化影响的不同,造成建筑工艺、建筑风貌的多元化。而在更深层次上,建筑形制的沿袭与革新,还反映出思想意识的保守、因循、糅合与外向等等复杂的社会因素。在认识岭南建筑的发展历史以及工艺技术特点时,注意到其多元性和复杂性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注意到从岭南建筑与其他地域建筑文化的联系和比较上来观察、评价其地位和特点,也是很有必要的^[2]。

建筑文化具有延续性,同时也具有时代性。观察岭南建筑文化的发展,有两个改变性的历史节点,一个是秦汉时期中原建筑文化对岭南建筑的统治性改变,一个是清朝时期西方建筑文化对岭南建筑风貌的冲击。再结合解放后形成的在中国现代建筑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岭南派建筑”和“岭南建筑学派”,就基本上构成了岭南建筑文化源流的主线,能够清晰反映出岭南建筑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一、岭南建筑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要探讨岭南建筑文化的源流,就先得从岭南这块独特地域的自然特性和人文特性进行理解和认识。

1. 背山面海的独特地理环境

岭南位于中国南方,因在南岭(又称五岭)之南得称,一般是指南岭山脉以南,包括广东省、海南省、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还有香港和澳门(图1-1)。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岭南设桂林、象、南海三郡。粤西属桂林郡,海南及南路一带属象郡,广东省大部属南海郡,南海郡治在番禺(今广州)。

所谓五岭,史书记载互有出入,综合《广州记》《南康记》《舆地志》《水经注》诸家所说,五岭的具体位置是:

大庾岭,在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庾县南境,与广东省南雄县接壤,为粤赣交通要道,秦时的横浦关即在此岭之上。

都庞岭,在今湖南省蓝山县南和广东省连州之北,而不是今日位于广西灌阳和湖南江永之间的都庞岭。秦时的湟溪关即在此岭之上,亦为由湘入粤之道。

骑田岭,在今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和宜章县之间,为湘粤通道,秦时的阳山关即在此岭之上。

萌渚岭,在今湖南省江华县和广西贺县、钟山二县之北,为由湘入桂之道。

越城岭,在今广西兴安县之北,为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目前尚存兴安县严关和秦城



图 1-1 岭南区域简图
(彭长歆《岭南建筑的近代化进程研究》)

遗址。

可见,五岭的位置都在南岭山脉一线之上,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再东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东达于海,其间大小山岭不计其数,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古代的统治者总是利用五岭作为划分行政区界的地物标志,所以五岭也是诸省区的边缘。五岭山脉以南的地区称作岭南,今天主要是指广东、广西、海南地区,其中广东被认为是岭南的核心区。

岭南地形复杂,广东背靠五岭,面向南海,与海南岛隔琼州海峡相望。广东境内,有山地、丘陵、台地和平原,还有岛屿及漫长的海岸线: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35.3%,主要分布在粤北、粤东和粤西的内陆地区;丘陵和台地分别占 27.4% 和 13.7%,分布在沿海一带;平原占 23.4%,以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最大,在全国的各大三角洲中分别列第三和第六位;还有长达 3256 千米的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港湾。平原和海岸线,对广东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沿海河流成网,形成三大水系,即由北江、西江、东江组成的珠江水系,由梅江和汀江组成的韩江水系,以及数目虽多而互不关联的沿海水系。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其基本地势为南部较北部为高,岛南为五指山地,北部为丘陵、台地,全岛有 1470 多千米海岸,有南渡江、昌化江和万泉河为主的百余条河流。

由于南岭的阻隔,早期开发落后于岭北;后期,借面海之利,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上述因素对于建筑发展的步伐及形成独特的风格,有直接影响^[3]。

2. 不断汉化的历史环境

岭南先民属百越民族,在漫长的史前社会及先秦时期中,早已与岭北有着文化交往。在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远远落后于中原和楚、吴、越等地,直到秦始皇征服岭南时,这里仍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不仅地旷人稀,而且部落分散,互不统属,大部分南越族人仍过着火耕水耨的农耕与渔猎并行的原始生活。秦统一全国后,大批中原人进入岭南,改变了岭南的人口结构,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一整套文化教育制度,开始了开发、改造岭南的历史。中原文化为主的岭北汉文化的大规模融入,

促使岭南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和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疆图。东汉建安以后,中原动乱,战祸不绝,大批中原贵族及平民涌入岭南,加速了岭南开发的历史进程,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相对落后的南越族,不断趋于汉化,南越本土文化也不断淡化,终于为汉族文化所取代。明代嘉靖年间编撰的《广东通志》说:“自东汉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人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古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大致说来,岭南自两晋以后,除数量不多、僻处于深山峒溪的南越族人,因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没有接受汉文化,发展成今天的少数民族外,绝大部分南越族人已经汉化。

至唐宋时期,汉文化在岭南已是主导地位,岭南的珠江三角洲,社会文明程度已渐渐接近中原和江南富庶之区,商贸繁荣的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至明清时期,岭南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一向较为落后的潮州府也迅速发展为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至清代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岭南第二大城市。

鸦片战争以后,岭南成为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地区,广东成了我国最早出现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地方,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辛亥革命以后,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

岭南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岭南建筑相应的发展时期。大致先秦是萌芽时期,秦汉至南北朝是起步时期,唐宋五代是形成时期,明清是成熟时期,晚清及民国是演变时期。岭南历史的演变必然具体地反映到建筑上,比如军事上,秦汉时期兴建的堡城塞障,反映了这一时期巩固统一与割据守土的斗争;明清时期卫城所城、炮台烽燧的营建,表明了岭南在抵御外侮、镇压反抗、巩固封建统治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至于烈士陵园、纪念碑等建筑的构建,表明了近代岭南的觉醒和斗争之激烈^[4]。

3. 不断融合衍变的民俗文化环境

岭南建筑的民俗文化背景可分为内、外部因素来分析^[5]:就内部状况而言,岭南地区土著文化为百越文化。随着北方汉民族的大规模迁移南下,融合衍变为属于汉文化的广府、客家和福佬三大民系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组合,大体可划为四个文化区及相应的文化核心区和文化亚区,从而形成了泛珠三角的大岭南概念,使岭南建筑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拓展。

粤中广府文化区(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和西江、高阳两个亚区);

粤东、粤西、海南福佬文化区(潮汕核心区和汕尾、琼雷两个亚区);

粤东北—粤北客家文化区(梅州核心区和东江、粤北两个亚区);

少数民族文化区(粤北瑶苗族、粤西壮族、粤东畲族、五指山黎苗族亚区)。

就外部因素而言,岭南周边的地域文化,视其发展与传入状况及毗邻位置,因时因地有不同的影响。比如,秦汉以前,较多受到楚文化的影响,秦汉以后,中原文化、两湖文化、江南文化先后对其有较大影响。粤北受湘赣文化,粤东受闽南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尤其是福佬文化,其命名已点出这一民系文化的直接渊源。据有关专家考证,自唐代以后,正史书上已不再出现越族这一名称。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南越族在内的古百越族,终于在与汉民族的交融中消亡了,但在文化上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古南越族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改造、融合过程中,仍然以变异的形态保存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或是超越,或是表现为拒斥、对立、反传统的倾向,从而形成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岭南特色。

由于广东有着与海外文化交流的久远历史,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近代社会的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加上澳门、香港被西方殖民统治之后迅速西化,传教士的进入,还有众多的华侨在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使岭南率先接受西方近

代的思想和先进技术,岭南文化从总体上呈现出开放、兼容的特性。

民俗文化背景对岭南建筑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百越民族对巫术的迷信及多神崇拜的民俗流风使得岭南庙宇建筑庞杂繁多;为维系聚族而居的移民宗族,宗祠建筑遍及城乡;为适应不同民系、文化区的生活习俗而构成不同的建筑文化景观;著名宗教建筑的存在,反映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传入岭南之早及它们传播的轨迹;明清礼制建筑的兴筑,尤其是功名、贞节坊在潮州、琼山等地的大量建造,反映了封建礼制在这些地区的强化统治;侨乡建筑在吸纳外来建筑文化上开风气之先;西方建筑文化在开埠城市、教会建筑中得到移植;毗邻地区的民俗文化对岭南各民系建筑分别刻下了烙印,例如潮汕建筑精于石构,其工艺技术发源于福建,客家建筑中的围屋是江西、福建客家文化的传衍。

4. 经济环境

古代岭南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上的开发基本上同步推进。上古时代,岭南地广人稀,五岭障阻,因而岭南社会的发展进程比中原地区要迟缓一千多年。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中原文化的推进大体沿着湘桂走廊进入粤西和越过大庾岭进入粤北,带动了从东向西、从北向南、由点及线的开发。处于岭南中心地带的番禺,从汉代开始被称为都会,是开发的重点。雷州半岛的徐闻、海康则是早期贸易的重要口岸。这些地方率先使用了砖瓦。随着国内外陆海交通的发展,广州跃为世界著名大港,逐渐发展成商业大城市。海南岛在隋唐时期完成了环岛建置,开始了北部、东部、东南部的开发。

宋代岭北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加快了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南宋后期,两个三角洲的经济、文化地位超过了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粤北。宋代以后,传统商品经济在广东活跃起来,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渐臻成熟。珠江三角洲市镇不断发展和繁荣。明清时期,广东的经济、文化跃居全国先进行列。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州府县为核心的城镇体系,明嘉靖年间,全省圩市有439个。明代海南出现了“鼎臣继出,名满神州”^[6],人文肇兴,一时之盛。清代,形成了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广东四大镇的城镇系列。圩市发展更快,乾隆年间珠江三角洲地区就达到570个之多。粤东巨镇潮州主要在此时期形成历史文化古城格调。这一时期,广东各地掀起大规模的城建工程,大量使用砖瓦等建筑材料,出现千斤顶、手提卷扬机等简单机械。砖刻、石刻、木刻、彩画以及陶塑、灰塑、瓷贴、铜铁、玻璃饰件等装修工艺非常普遍,尤以佛山陶瓷塑饰及潮州金漆木雕成就为高,岭南建筑的装饰工艺创造出杰出的成就,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

近代广东多渠道地汲取西方一切先进实用知识和技术。在建筑上,城镇规划、建筑技术、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建筑功能等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城乡建筑文化重新拼接组合,形成岭南建筑景观的崭新面貌。

岭南建筑景观的分布,与经济开发的推进有密切相应的关系:先秦集中于粤北、粤西的人粤要道上;秦汉以后集中于广州和沿西江、北江流域以及雷州半岛水陆交通要道的点和线上;宋以后,以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为重点,向全省各地推进;明清时期,两个三角洲更是集中了岭南建筑精华。清末民初,岭南建筑之杰构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和开埠城市,勾划出岭南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创新,新技术、新材料也开始广泛运用。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对外往来的发展,岭南建筑形态也随之改变,建筑材料起了变化,建筑技术得到提高。建筑材料从木构为主,发展到木、石、砖并重,至近代则是钢筋混凝土、钢构件,改变了建筑物体量和功能。

二、岭南建筑文化发展的中心——广州^[7]

本书所涉及的岭南地域概念主要界定在今广东地区,适当涉及广西、海南、香港及澳门地区。而广州自秦统一岭南始,2000余年来一直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自然也就成了岭南建筑发展的中心。

广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远在七八千年前,先民们便已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广州确切可考的建城史,至少已有2000多年。先民们居住的建筑形式,目前考古上仍未发现确切的资料,广州炎热、潮湿多雨的气候和水乡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广州先民的住居选择是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一种底部架空住宅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在地上栽桩立柱,在柱上架板作为居住面层,上面再立柱架梁。人居其上,可以躲避毒蛇猛兽的袭击,也可避水患、防潮湿。

秦时岭南统一,设南海郡,设番禺(今广州)为郡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任命任嚣为南海都尉,任嚣在番山和禺山(今仓边路以西)上修筑了番禺城,俗称任嚣城。任嚣死后,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建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城,把城区扩大到周长十里,俗称越城或赵佗城。

1983年8月,南越国二代国王越昧(又名赵胡,公元前137—前122年在位)的墓葬在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掘,墓室规模之大,出土珍贵文物之多,为全国所瞩目。

1997年7~12月,广州市文化局组织的发掘队在中山四路西段发掘出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御苑的一部分,成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秦汉以后,中原文化传入南粤,中原的建筑文化与当地建筑文化相互交融,使广州建筑的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从近千座汉墓发掘出土的明器陶屋模型来看,有干栏式、楼阁式,平面有“日”字形、曲尺形、三合院等多种形式。

公元217年,三国吴交州刺史步骘把交州治所从广信(今广西梧州)迁来番禺,重修越城的西半部,把城区向北扩大。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广分治,分合浦以北地方为广州、合浦以南为交州。不久又合并,永安七年(264年)复分,广州正式得名。

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广州为海外交通的门户,同东南亚、印度、西亚、北非、欧洲都有海上往来。东晋隆安年间(397—401年),高僧昙摩耶舍来广州,创建王园寺(今光孝寺),南朝梁武帝中期,禅宗创始人达摩禅师由南天竺经海路来广州,创建了西来庵(今华林寺)。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大港。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诏在今黄埔区庙头兴建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祭祀南海神。南海神庙是中国著名的海神庙,庙前有码头,海舶进出按例到庙拜祭,庙旁扶胥镇可进行交易。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

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大批阿拉伯人来到广州,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唐贞观元年(627年),怀圣寺建立,寺中有光塔。在今光塔街一带有供外侨居住的蕃坊。

五代时,南汉国以广州为都,扩建广州城。在城区四方各建庙宇7座,共28座,以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8]药洲园中,有奇石9座,称为九曜石,以象征梵历中的九星。

北宋庆历四年至熙宁四年(1044—1071年),广州先后扩建了子城(中城)、东城和西城。绍圣四年(1097年),重建六榕寺花塔,高57.6米,八角九层,美丽壮观。南宋时又增建雁翅城。宋代羊城八景有“扶胥浴日”“石门返照”“海山晓霁”“珠江秋月”“菊湖云影”“蒲涧濂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

明代是广州城大发展的时期。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将宋三城合一,并向东、北两向扩大,越秀山城上建镇海楼。城周长21里,称老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在城南筑外城,周长六里,称新城。明朝中期,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港。为安顿外商,永乐三年(1405年),在今十八甫路附近设怀远驿,广修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明代广州十分繁荣,屈大均云:“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9]

清代在明代新城之南修建东西两翼城,西关和十三行一带成为繁华的城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为了防洪排涝,广州自宋至清建有六脉渠,减少了城市的洪涝灾害。

清代广州建筑风格多样,有集岭南工艺及装饰之大成的陈家祠,有海幢寺、华林寺等寺庙建筑,也有受外来文化影响所建的西洋式建筑,如十三行的建筑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西洋建筑风格进一步传入,其典型代表为广州天主教圣心教堂,俗称石室,建成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历时25年;其设计师为法国工程师,风格为典型的法国哥特式,由中国广东揭西工匠蔡孝为施工总管。圣心教堂高55.56米,是我国最大的一座哥特式教堂。这一时期建成的西洋风格的建筑还有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1916年建成)、粤海关大楼(1916年建成)、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沙面租界建筑群等。

这个时期也有若干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民族风格的建筑,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由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1931年建成),此外,还有由林克明设计的广州市府合署(现市政府大楼)(1934年建成)、广州中山图书馆(1933年建成)、中山大学校园建筑(现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内)等等。

骑楼式商业街道是近代广州建筑的一大景观特色。骑楼为岭南临街楼的一种建筑形式,楼层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上,形成柱廊,沿柱廊为商业店铺,这种建筑形式最早见于2000多年前的古代希腊,后来风行于欧洲,近代传播到世界各地,广州从20世纪初出现骑楼,20~30年代骑楼商业街道蓬勃兴起,成为近代广州一大特色。第十甫路、上下九路、中山路、解放路、人民南路均为骑楼商业街道,西濠口一带的骑楼建筑最有气派,新亚酒店、南方大厦、爱群大酒店均为早期骑楼中的典型代表。

广州近代城市住宅也颇具特色,其中有西关大屋、竹筒屋和东山花园洋房等。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广州现代建筑历史的新篇章。广州现代建筑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出现了现代岭南建筑,它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北京的“京派”建筑、上海的“海派”建筑风格各别。

岭南建筑离不开岭南文化,岭南建筑艺术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往自然山水、富于生活情趣、务实、勇于进取和革新,是岭南文化的特色。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岭南文化与太平天国、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等事件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大胆创新、奋发进取成为广东各行各业的共同风尚。文化艺术如此,建筑也不例外。岭南现代建筑展现出一批全国建筑界公认的优秀作品,岭南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建筑师。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现代岭南建筑已经开始萌芽,一些岭南建筑的前辈学者和建筑师已经为现代岭南建筑的出现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前辈学者和建筑师包括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以及林克明。

现代岭南建筑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敢于进取和创新,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已出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建筑作品;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后,成千上万的全国各地建筑师涌向岭南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现代建筑创作的繁荣。

现代岭南建筑最杰出的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莫伯治,另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余峻南。余峻南、莫伯治等合作设计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获奖无数,开创了我国自主设计现代化酒店的先河。莫伯治与何镜堂等合作设计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被世界建筑师协会评为“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

第二节 岭南建筑文化发展的特点

背靠南岭面向大海的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位置和地域特征,孕育了百越民族的航海文化和农耕文化,其发展与交汇使岭南文化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状态和素质,对于建筑发展的步伐及形成独特的风格,有着直接影响。

汉文史籍从很早起就关注南方生态特殊性对人文的影响。《后汉书·南蛮列传》载传说时代的南方地区“所处绝险,人迹不至”“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描述的就是湿热的山地丘陵环境的特殊性。

从岭南早期建筑来看,岭南地区远古文化自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砾石石器工业并持续不断,土著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建筑尤其表现出以多样性来适应不同环境的形式特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半地穴式、地面式、干栏式建筑形式共存,逐步发展为以干栏为主要特色的建筑形式。

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和中原建筑文化全面进入岭南地区,使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开始融入中原正统体系,也使岭南建筑的发展开始全面融入中原建筑体系,并且根植于岭南背山面海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气候及人文环境,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建筑个性,使岭南建筑文化成为中华建筑文化中精彩绚烂的一支。

我们将古代建筑发展分成官府城市营建、宗教建筑和民居建筑三大类来分析,总结古代岭南建筑与中原建筑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大致可以将其分成三条历史纵线:

- (一)融入中原建筑文化的岭南建城轨迹。
- (二)保持地域特色的岭南宗教建筑发展轨迹。
- (三)个性鲜明的岭南民居体系发展轨迹。

这三条轨迹基本上反映出古代岭南建筑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

近代以来,延续几千年的中华建筑格局被打破,西方建筑文化随着强大的殖民主义扩张进入了中国,岭南地区作为西方列强最早登陆的地区之一,其建筑风貌的改变也早于其它区域。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其实可视为全球化的开始,中华建筑文化和岭南建筑文化自此进入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在这个历史发展轨迹中,从发展特色来看,岭南建筑文化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

(一)18 世纪早期广州十三行时期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岭南建筑处于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相互交错的裂变发展阶段。

(二)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现代主义建筑开始在岭南得到传播和实践。生于 20 世纪初的第一代岭南建筑师留学归来,成为传播和实践现代主义的主要力量,并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的创作在历史上跨越了近代和现代,但建筑理念和主张则前后基本一致,即践行现代主义,强调技术性、务实性,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岭南派建筑”。

(三)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的建筑创作融入到了全球化之中,岭南建筑的个性特色已逐渐弱化,但岭南建筑师群体则依托开放、包容的岭南文化环境以及发达的经济环境,根植于岭南派建筑的土壤中,发展为“岭南建筑学派”。

一、岭南先民聚居空间向海性的特点

从人类居住遗址的一般变化发展规律来看,人类必然要从洞穴走向河流、山岗、台地,并沿河流走向江河海洋,以寻求增加食物来源和扩大生存发展空间。贝丘和沙丘遗址是富有地域特色的聚落遗存,它们昭示着岭南先民不断开拓和壮大并逐步走向海洋的历程。背靠南岭面向大海的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位置和地域特征,孕育了南越民族的航海文化和农耕文化,其发展与交汇使岭南文化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状态和素质,对于建筑发展的进程及形成独特的风格,有着直接影响。

早期岭南先民的聚居空间主要有贝丘聚居和沙丘聚居,体现出了鲜明的“向海性”“在海性”的聚落特点,是海洋文化所赋予的典型特征,亦是在大的地理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空间特征。

贝丘遗址是岭南早期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包含大量的先民食用后遗弃的贝壳为特征。在贝壳的文化层之中夹杂着其它动物遗骸和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还发现房基和墓葬。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沿海的海河岸边的山岗坡地和台地上,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发现最多。文化堆积很厚,大多在一米以上,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时期的文化堆积。其存在时期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而属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中贝壳的数量明显减少。贝丘遗址的最大特点是地层堆积中的大量贝壳,大型的贝丘遗址中贝壳可达几百吨。

沙丘遗址也是一种早期人类居住或活动的遗址,是在沙堤、沙滩、沙洲上的古文化遗存堆积遗址,这类遗址主要分布于现今珠江三角洲前缘、海滨或海岛的海湾地带,沿海海湾岸边的旁有小河、背后环山的第二重沙丘土,高出海面 5~6 米。沙丘遗址与贝丘遗址不同之处在于,除了遗址多分布于偏南的地点,遗址文化堆积沙质土之外,在这类遗址之中,贝壳的数量也相对较少,而鱼类遗骸相对而言较多,且多数为海生属种。沙丘遗址集中分布于今香港、澳门、珠海、深圳、中山南部等地,多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也有的出自青铜时代。

舟楫构成了岭南先民的水上生活空间,在距今 4000 年前后,沙丘居民已经掌握水上停船技术,宝镜湾遗址等地出土了当时的大型石锚。《淮南子·原道训》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绁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越族对海洋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船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对海域的探索和占有是岭南居民的生活重点。古代的汉人认为越人“居于海上”“便于舟”是其特点之一。对于居住、生活在南海沿岸一带的越人,这一特点应该更为明显和突出,宝镜湾岩画真实、形象、神秘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总体来说,在海性、向海性和环海性是沙丘和贝丘遗址聚落的典型特征。这些滨海、山地聚落中,以干栏为主的居址沿等高线排布,鳞次栉比、迤逦山野。建筑聚落性群体“质”的生成孕育出建筑单体点“量”的积累,整体呈现出宽阔的“面”。涛沙轻盈流动和动静辉映的空间美学,这可能是“在海性”“向海性”赋予岭南建筑空间美的内蕴所在。

二、岭南古代城市融入中原建筑文化的建城轨迹

当秦始皇在咸阳兴建阿房宫、骊山陵等壮丽工程时,岭南的建筑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秦统一岭南,在岭南推行郡县制,赵佗建起南越国,融入了勃勃发展的中原文化,岭南建筑史随之掀开转折性的一页。

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的中国建筑体系,在秦汉时期臻于成熟。文明起步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岭南,受秦末汉初社会政治、军事变革的剧烈震荡,建筑技术产生了飞跃性的发展,得到迅速的提高。陶仓、灶、井、屋等明器在广州始见于西汉中期墓葬,而在长沙,则始见于西汉晚期墓葬。广州东汉墓出土的庄院、城堡、碉楼模型较之长沙东汉墓出土物规模更大、形制更复杂。说明当时广州地方经济包括建筑发展的水平超过了长沙,也说明从汉代开始岭南加快了接受中原文化的步伐。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秦汉时期岭南建筑文化与中土的建筑文化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与《史记》《汉书》上提到的同时期其他都会相比,面积不足2平方千米的番禺,城市规模要小得多。南越王赵昧墓与同期汉诸侯的大崖墓(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山东曲阜鲁王刘庆忌墓)相比,在规模、工艺、排水设施设计上都逊色得多。砖瓦在岭南的出现时间也大大落后于内地。中原地区的砖室墓,在西汉末期出现条砖顶的筒拱结构,东汉初发展为拱壳顶,至东汉派生出叠涩结构。岭南砖室墓在东汉始出现筒拱结构,东汉中后期才出现拱壳顶。在岭南各地发掘的东汉墓中,仍然存在一批规模不小、墓主地位较高的土坑、木椁墓,说明各地砖瓦技术仍不普及。

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在低起点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外来先进文化极强的吸收性,同时又融入地方特色,创造出适合本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工艺技术,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为依托而又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建筑体系。

夯土建筑普遍应用于军事防御的城墙、关隘乃至坞堡等大型建筑工程中。在雨水较多的南方,夯土技术难度更高。岭南现存的秦汉夯土城堡,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以砾石垫基、泥石混合分层配料等方法,夯土十分坚实。延续到近代,夯筑技术在岭南民居建筑中仍得到广泛应用。

岭南建筑在石构技术方面的范例有,修筑南越王墓,大规模采石并运用水上运输,在现今难以想象的生产条件下,开凿深20米的岩穴,开挖及回填约4000个土石方,吊装重近三吨的石板,乃至设置自动顶门石,都是创造性的劳动。修建南越王官苑,大面积铺砌切合工巧的冰裂纹石板,更是卓越的工艺。宫署遗址出土的八楼石栏杆,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石栏杆的构件;南越国宫苑遗址出土石渠、石板平桥以及构筑石室的两列高1.9米大石板,在我国建筑史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岭南石工在石料开采和施工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渐形成鲜明的建筑工艺传统,延续至今。

南汉时广州的城市建设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由于广州城此时的飞跃发展,为广州后来成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南汉覆亡后不久,北宋即在此基础上扩建了“广州三城”(子城、东城、西城),城市面积近20平方千米。东至今越秀中、小北路;西至今人民路;南至今大德路;北至今东风路。北宋初扩建三城沿袭了南汉时期城市发

展的成果。

南汉文化尤其突出的是建筑文化。南汉王朝靠外贸积累了大量财富,开始大兴土木,而其建筑风格不是完全仿效中原,而是依据岭南自然条件,在华丽中发扬了玲珑剔透的特色,构造异常巧妙。建筑材料及装饰因地制宜,大量使用南海特产。《新五代史》记载:刘龔“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土木华丽,聚珠饰之”“水渠设珍珠、水晶,东西楼分列琥珀”,南薰殿“柱皆通透、刻缕,础石各置炉燃香,有气无形”。流花桥“华灯映水,画舫凌波,荔枝垂岸,香草浴月”。仅从这些片断史料即可窥见,南汉已开创了岭南园林建筑之先河。将自然景观改造成大型园林,在岭南首创于南汉,南汉药洲为中国园林最早的地面景物遗存。南汉宫苑重视花、石的特色,早于北宋皇家的花石纲,对以后的岭南园林风格有深远影响。

宋元时期是岭南大规模开发的时期,汹涌南下的移民潮,使岭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大缩小了岭南社会生活同岭北中土的差距,至南宋以后,基本达到同步发展。宋元以后岭南的居民结构已衍化为以汉族为主体。与北方相比,南方显得更为稳定繁荣。在这种背景下,岭南建筑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新气象,在宋元之际一度受到阻滞破坏之后,仍然有所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人口剧增、推进开发之需要,岭南掀起了大规模基本建设的高潮,岭南建筑工程技术产生了又一次飞跃性的变化。

宋元时期岭南建筑取得辉煌的成就,开始建立起与岭北建筑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

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时期,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岭南建筑文化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体系。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建筑装饰达到高超的水平。这一时期的岭南古建筑,历经天灾人祸,仍有相当数目留存下来,占现存古建筑的绝大多数。

明清时期岭南城市建设连续不断。各州县相继兴建或扩建砖城,相应兴建了宏伟壮观的城市景观建筑,诸如广州的镇海楼,岭南第一楼,潮州的广济门城楼,琼州的钟楼等。城市防洪、排水系统进一步完善。各类宗教建筑、坛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佛塔演化为风水塔,虽不及宋塔精致,数量却大为增加。以粤中、粤西花塔类的楼阁式砖塔,粤东的砖石混构塔,珠江三角洲的文塔为主构成了岭南古塔的特有风格。

明洪武三年(1370年),广州设立广州市舶提举司,管理朝贡事宜。永乐元年(1403年),广州西关蚬子步设怀远驿,建房舍120间,以招待往来贡使。怀远驿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明代的广州城不断扩展,分为老城和新城。老城大规模扩大一次,明洪武三年(1370年),将宋代三城合而为一。同年,扩展东城。明洪武七年(1374年),扩大北城,北跨越秀山(当时称越台山或观音山),在山上建镇海楼。城周长21里32步,称为老城,有八门。城墙高2.2丈,上宽2丈,下宽3.5丈。今天广州城内的主街,多为明代已有^[10]。明代的广州,繁荣富庶名闻天下。诗人孙蕡《广州歌》云:“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家千家万家室。”刻画出了广州当时的繁荣景象。

清代广州城垣,于顺治四年(1647年)在新城之南加筑直至江边的东西两翼城,此外无大增改。清代的广州,城区向西关、东关扩展。西关建了大片民居,手工业区也在西关大片形成。东关也沿江伸到元鉴街,形成今日广州主要市区范围。

三、岭南宗教建筑发展的地域特色

在岭南建筑诸类型中,惟宗教建筑始终为盛。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等级制度严格限

制着建筑形制和规模,只有在精神领域地位至尊的宗教寺庙才能不受限制;二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诸教在岭南的宗教活动都很活跃。因而,宗教建筑的兴建,甚或竭州县之财力,殫民间之积蓄。

随着中原晋室的“永嘉之乱”(311年),唐代的“安史之乱”(755—763年)和宋代的“靖康之难”(1127年)等历史动荡,中国文化中心的东南迁移,中原人士大批南下,给地偏一隅的岭南带来了若干中原古代社会制度和建筑制度的影响。由于这里社会相对稳定,所以其古制得以较好的保存,这对于今天我们考察古代社会制度和建筑历史研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从岭南古建的大木构架形式分析,约在北宋时期,一些文化发达地区建筑的大木构架技术已经成熟。从梁架结构上来说,以北方抬梁式为主,兼有穿斗、干栏地方建筑特色的构架体系已趋完备。在具体构造做法上,许多明清建筑仍然保留了北方唐宋时期的月梁、梭柱、生起、侧脚、柱槓、剏牵等做法。

唐代,岭南佛教有两件大事,一是六祖慧能在岭南创立禅宗南派渐而被公认为正宗;二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有不少高僧交汇于此,不空南下、义净西行、鉴真东渡、金刚智等入华,推动了佛教传播,也带动了佛教建筑的兴建。

唐代的广州经济繁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也是唐代唯一的通海夷道,直达波斯、阿拉伯半岛等地。大量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居住在城西。官府为了加强管理,设立蕃坊。据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唐时广州蕃人达12万。唐开元时(713—741年)广州蕃人有64250户,元和时(806—820年)为74099户,人口至少达30万^[11]。广州蕃坊区范围颇大,北到中山路,南达惠福路和大德路,西抵人民路(西城之西墙),东达解放路。伊斯兰教建筑广州怀圣寺塔和佛教建筑潮阳灵光寺大颠祖师塔,造型独特、不拘一格,反映出外来文化在岭南传播交流之活跃。

鉴真第五次东渡漂流到海南,曾主持修缮延德郡(今崖县)大云寺佛殿,重建崖州(今文昌县)开元寺,不仅州官支持,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出钱出力,建成佛殿、讲堂、佛塔,是当地之重要建筑。鉴真具建筑设计的才干,至今仍矗立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是他亲自参与规划并主持建造的。可以想见他所主持的建筑工程,为岭南宗教建筑引进了大唐新风。今存的岭南宋代寺庙建筑,如广州光孝寺大殿、潮州开元寺大殿、南雄三影塔,尚可以见到唐之遗风。

由于地方官倡导、民间信佛风气浓郁及僧众的鼓动,寺院建筑被推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广东有寺院105所,禅宗开宗之地的韶州有25所,“寺最众,僧最多”^[12];广州是中外交往频繁之地,禅宗、密宗、律宗荟萃其间,全州有寺院19所;在唐代中、后期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的潮州,寺院有18所;六祖出生地的新州及罗浮山所在的循州也分别有12所和11所寺院。此时,佛教也传入海南、雷州半岛一带,但寺院并不太多。这一时期创建并香火延续至今的名寺,有潮州开元寺、潮阳灵光寺、新兴国恩寺、梅县灵光寺等。曲江华林寺、广州光孝寺在唐代也有过扩建。

隋、唐敕建南海神庙规模宏大,后世虽屡有修建,基本规制却无以逾越。

南汉崇尚佛教,更加热衷于建寺造庙,各地寺院林立。环绕兴王府四方各建7寺,有28寺以应天上之二十八星宿。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境内南汉所建寺院有45所,如韶州建兴福寺,“数十里广置田庄”。南汉时期佛教建筑遗构,有今存于广州光孝寺的西铁塔、东铁塔以及存于梅州的千佛铁塔,均属全国现存的有确切铸造年代的最早一批铁塔,形体硕大,工艺精湛。

分析现存的岭南宗教建筑,不难发现它们大体上保持了中原营造礼制,但都或多或

少地体现出了岭南建筑的一些特征,反映出在严格的宗教礼制和营造法式之下,岭南古建筑根据自身人文环境和地理条件做出变化,并逐步成为中华建筑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支。

以光孝寺为例,光孝寺原存的几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都保留了宋代的建筑制度风格,并表现出岭南建筑的一些特征,是研究岭南古代殿堂建筑形制与大木做法式的宝贵实例。除了光孝寺外,岭南至今仍有大量的优秀古建筑遗存,都保持着岭南地域特色。

在活跃的海外贸易之下,西方教会对岭南内陆的传教活动同样伴随有零星的西洋建筑活动的发生。基督教对岭南的影响,可以上溯至唐代,阿拉伯商人阿布·塞德·哈爽在《印度中国见闻录》中称唐末黄巢进入广州时,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多达12万人,其中包括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教徒^[13]。但与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对岭南影响不大,故多未见于史。基督教大规模传入岭南并产生较大影响是在明清两代,以澳门为中转,西方传教士在岭南进行传教活动,教堂随之不断建设。

四、岭南民居体系独特的发展轨迹

秦汉以降,铁农具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砍伐林莽、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都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在东汉中后期,岭南已经比较普遍使用牛耕,农业耕作有了较快的提高。

农耕生活带来聚落的不断壮大,也带来居住形式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中国的东南社会自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多次在相对集中的时段接纳了大规模的北方移民,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整合与分化,逐渐形成东南地区汉族的五大民系(越海民系、闽海民系、广府民系、客家民系、湘赣民系)以及社会文化的不同区系类型。而其中岭南的广府民居、客家民居、潮汕民居是岭南民居体系的特色。

岭南民居体系的形成与特色要从汉代出土的陶屋模型开始研究,岭南早期民居的干栏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及坞堡建筑,源于岭南人民长期生活在空气湿润、雨水丰沛的地区,为了防蚊虫和毒蛇攻击而创造的结合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特点的特色岭南建筑。而这些特色岭南建筑更产生了长脊短檐、脊饰、反宇、歇山、门窗和独特的屋顶架、斗拱形式。所以秦汉出土的陶屋模型,揭示了这么一个事实,岭南建筑在融入中原建筑体制的同时,保持了本土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随着历史的发展,岭南民居体系形成广府民居、潮汕民居和客家民居三大主要分支。

广府民居主要类型有:竹筒屋民居、明字屋民居、三间两廊民居、大型天井院落式民居、庭园式民居。

潮汕民居主要类型有:下山虎、四点金式、驷马拖车式、百鸟朝凤式。

客家民居主要有两种特殊类型:楼、围龙。

广府民居聚居形态及空间特征:广府民居产生于明清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大家庭普遍解体,儿子成年即分家另立门户,“三间两廊”、明字屋、竹筒屋这种小规模居住模式也适宜于乡镇城市的置业和享受热闹的市井生活。

广府宗祠强调路、进、庭,构成气势恢宏的祠堂建筑。“路”分三路、五路,“进”分三进、五进、七进,故又称“七叠祠”;“庭”一般为合院式,后庭采用廊院式。

广府庭园是岭南建筑的一大特色,庭园亦称庭园住宅,因庭园占地面积比较大,又独立布置成园,故称“庭园”。清代的广州私家园林众多,士大夫和富商均竞建私园,风气甚盛,较著名的有海山仙馆、万松园、余荫山房、小画舫斋等60多座。广府庭园后来演变成

“岭南园林”，与北京的“皇家园林”，江南的“苏州园林”相媲美，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园林。

其聚居空间特征：广府民居呈现出宅祠分离的梳式规划建筑布局特色，住宅以小家庭的方式存在，适应经济的要求，而宗祠的建设则呈现集聚宗族经济实力，以修葺恢弘一时的祠堂。更有甚者相邻近的寒姓单家，以抽签、占卜的方式来确定共同的姓氏，并且虚拟共同的祖先，合同组成一宗族。这反映出岭南一带基层社会普通的宗族化趋势，宗族化聚居现象“南盛于北”而且“愈南愈盛，愈北愈弱”，这可能与古代岭南部落“小聚合、大分散”的聚居形态相一致。

广府大型的天井院落式民居形成的厅室、门官厅、上方神位、祖宗位的一条纵深的中轴线，以及西关大屋修建在主要的街巷上，达几十米深，形成“青云巷”，取“平步青云”之意。广府民居体系最少保守，最开放，最善于吸收新材料、新技术，典型的例子就是陶塑、灰塑和彩色玻璃的使用，满洲窗的结合亦是广府民居的一大特色。

潮汕民居的聚居形态：潮汕民居有“京华帝王府，潮汕百姓家”的美誉。潮汕人聚族而居，他们在传承中原文明的同时，因地制宜，又不断融通创新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下山虎”讲究中轴分布，体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原理；“四点金”采用“井”字形格局，由相向的两个一厅二房构成，其意象为人体，后座的厅堂为身，“大房”为两肩，“伸手房”为双臂，“下房”为交手，抱气入怀，中间天井则为虚怀纳气的空间，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观念。

潮汕民居聚居空间特征：它完美地阐释了儒释道三教和谐融合的精神境界。居室讲究伦理纲常，讲究天人合一，强调营造精神空间“过塘风”“单跑狮”“五壁莲”“百鸟朝凤”“龙虎门”等力求将大自然中的“天时、地气、顺风”融合于整体建筑中，体现潮汕民系对中原“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的坚守。

客家民居的聚居形态：集族而居，讲究风水，讲究围合，吴庆洲教授把它归纳为：具有外墙抵御手段，内部组织结构、生活供给系统，这种对外具有防御性的住宅建筑，是为了生存、生活而生产的建筑。它的聚居空间形态具有“二重性”“向心性”和“中轴性”。它是以祖宗牌位为中心的一种家族人文秩序，这种“慎终追远”体现了历史含义，在家族延续过程中，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大家族聚集而居的建筑群，吴庆洲教授认为：家族群体凝聚力的产生，或多或少来源于客家民居空间围合的空间形态。

客家民居聚居空间特征：祠宅合一，象天法地。民间认为客家人是龙的传人，所以客家人精神上讲究“胎土”，追寻“龙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客家人的聚居空间特征是中原农耕文明聚居形态“大聚合、小分散”的具体体现。

五、中西交融下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

明末清初，西洋式建筑开始出现在岭南，两千年的岭南传统建筑景观被打破。鸦片战争之后，西洋建筑大事进入岭南，特别是在几个主要的港口城市。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西方化”和“本土化”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碰撞、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艺术和城市景观的发展主线。西洋式建筑以及不久之后同样由西方传入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对传统建筑的颠覆，它们成为一个与岭南传统建筑区别明显的近代建筑体系，一直发展延续至今。而传统的建筑体系则在此消彼长中日渐式微，逐渐走向没落和消亡。

近代岭南建筑的兴起可以断定始于澳门城市建筑，清初时期即已规模性建设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则将西洋建筑直接传入了岭南腹地，为鸦片战争之后西洋建筑在岭南的大规